

论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的编写

董琳莉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内容提要 汉语国际教育是面向海外的汉语学习者。本文首先指出编写面向海外的国别化教材的必要性, 并强调编写这类教材的针对性原则, 最后从编写标准、多元化教材的设计、创造多媒体语言教学环境、语料库的建立和合作编写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编写策略和主张。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国别化; 针对性; 多元化; 汉语教材编写

Compiling Chinese Textbooks for Specific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DONG Lin-li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CE) is for the overseas learners studying Chine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compiling ICE country-specific textbooks for overseas students, lays stress on the pertinence principle of compiling the ICE country-specific textbook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compiling strategies and ideas concerning compiling standards,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creation of multimedia teaching environment, corpus building, and cooperative compiling.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ountry-specific; pertinence; diversification;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1958年，北京大学编写的第一部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北京大学邓懿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创了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历史。几十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出版了上千部对外汉语教材，为来华学习汉语的海外学习者提供了方便，为汉语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海外的汉语学习者越来越多，中国对外汉语教育也做了战略转移，逐步从国内转向国外，我们的教学理念也从“对外汉语教学”改变为“汉语国际教育”。当然，对外汉语教材也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们知道，对于海外的语言学习者特别是自学者来说，一部有针对性的语言教材是不可缺少的。随着教材使用人群的改变，如何编写出适合他们使用的汉语国际教育教材，就成为急需解决的课题。在这一前提下，国别化教材应运而生，为越来越多的汉语教材编写者所关注。

一、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编写的历史背景

（一）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1950年到1978年，全国各高校共接受培养的外国留学生仅有12 800名，他们几乎全部是由我国政府提供奖学金的。1978—1989年，全国共接受和培养了40 221名留学生，其中政府奖学金生13 699名，自费留学生26 522名。1990—2000年，全国共接受和培养了310 000多名留学生，其中政府奖学金生18 360名，自费留学生292 000多名^①。从1990年起到现在，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快速增长，学习者的层次稳步提高，学习目的和学习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越来越凸显（崔希亮，2010）。

随着世界范围内“汉语热”的持续升温，海外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2007年，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汉办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截至2016年底，全球共有140个国家设立了513所孔子学院和1 073个孔子课堂，

^① 参看郝平在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暨2009年年会上的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动来华留学工作科学发展”，吉林长春，2009。

各类面授学员 155 万，网络注册学员 59.7 万^①。孔子学院成为覆盖面最广、包容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全球语言文化共同体之一。

许琳（2007）明确提出，汉语国际推广作为国家大外交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六大转变，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推广机制“从教育系统内推进向系统内外、政府民间、国内国外共同推进转变”，推广模式“从政府行政主导为主向政府推动的市场运作转变”，教学方法“从纸制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

对外汉语的教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今天我们通常用“对外汉语教学”来指称“在国内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用“汉语国际教育”来指称“在海外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这样区分可以避免很多夹缠（崔希亮，2010）。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是一种非常大的改变。虽然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仍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李如龙（2012）做出了理论上的论述。

首先，指出了教学对象的不同。他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最初目标，是为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铺一条进一步深造之路。我们以北大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在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之前，仅仅是隶属于外事部门的一个名为“汉语教研室”的机构。其教育对象，仅仅是为那些想进入各系读本科或者搞研究的外国学习者扫清语言障碍。这些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主要目的，是用汉语铺路搭桥，以便在专业方面进行深造或者把汉语作为谋求相关职业的资本。到目前为止，国家汉办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就已经拥有了各类学员 210 多万人，加上在大中小学接受汉语教育的青少年，应有数百万之众。这些学员和到中国来留学的学习者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一是年龄相差很大，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学龄前儿童。二是学习要求不同，学习者不可能像在中国留学的学习者那样，在学校全日制“脱产”学习，有些只能是零打碎敲地积攒学习课时。三是学习目标不同。海外学习者的学习目的有很大不同，甚至有很多学习者仅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文字

① 引自孔子学院总部网站。

感到好奇，或者想了解中国这个神秘的古国才走入汉语学习队伍的。

其次，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的不同。来华留学生和海外的学习者即使都是初次接触汉语的零起点开始学习的，也会因为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的不同影响学习进度和效果。来华留学生除了在课堂内进行有系列的语境设计和密集的言语训练，还可以在课外，广泛接触中国人而获得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而海外的学习者通常缺少这种学习环境，也难得用汉语来交际。

针对以上不同，我们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立足于“请进来”的基础上，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的“走出去”，要让海外更多的想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而又无法到中国来的人在自己国家就能学习到。因此，对于从事海外汉语教育的教育者来说，应当在教学中，遵循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方针，针对不同的学习人群，采取不同的教学对策，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地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二）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的趋势

有资料表明，几年前国内出版的汉语教材就有 3 300 种以上，可是没有多少能“走出去”。

以北美地区为例，据说使用国内出版的汉语教材不超过 5 种，原因就是“水土不服”——不适应海外教学（潘先军，2013）。来自加拿大的崔建新（2005）就曾指出，“以在加拿大进行基础汉语教学时用得最多影响最大的《实用汉语课本》为例，一方面大家充分肯定其语法系统性，一方面又觉得该书内容不适于加拿大教学，关键在于它不能跟这里的生活挂钩，不能跟这里青少年的特点相结合。”据李明（2012）对北京外国语大学赴世界各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任教的 60 多名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调查，95% 以上的被调查者反映国内出版的汉语教材不完全适用，需要在教学中随时改编和补充。

在此背景下，面向海外的汉语教材编写的国别化问题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如赵金铭（2009、2010）、李如龙（2012）、刘颂浩（2007）、吴应辉（2013）、周小兵（2013）、潘先军（2013）、李泉（2015）等，广泛讨论了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问题与对策等问题。

特别是在 2009 年 12 月 19~20 日，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主办了“2009 年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会上明确提出“国别化汉语教材”“汉语教材国别化”的观念。这次会议以后，“汉语教材‘国别化’的

呼声越来越高”（陆俭明，2013）。迄今以“国别化”名义召开的汉语教材研讨会已有四次，进一步促进了“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研究（李泉，2015）。

2010年，国家汉办组织了“优秀国际汉语教材评选”活动，从由77个国家的3500余名教师推荐参选的2530种教材中选出20种优秀国际汉语教材，入选教材基本上是针对国外汉语教学的需求而编写的国别化教材（于锦恩等，2011）。可见，国别化日趋成为解决海外汉语教材问题的一剂良方。正如刘乐宁（2010）所说“编写国别教材是汉语国际推广的必然”。

21世纪以前，海外使用的汉语教材，大多为国内编写并被推广到海外的通用型教材。这类教材，因为体现着国内汉语教材的较高水准，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在国内广泛应用外，也受到海外汉语教学机构的重视。像《实用汉语课本》，就曾在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学校里，作为主干教材使用。即使到了21世纪，这类通用型汉语教材，在海外仍占有一定的市场。为了适应汉语国际教育在全球大发展的新形势，国内有关部门，在汉语国际教育教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仍在大力推广这类通用型教材。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外国汉语教师来华研修班，指导他们掌握教授《新实用汉语课本》《当代中文》等汉语教材的方法，目的也是为了扩大这些教材在海外的影响力，使这些教材得到广泛的关注和使用，尽可能地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

在通用型教材占领海外汉语教学市场的同时，海外也有不少设有汉语专业的大专院校，使用自己编写的汉语教材。这类教材的产生，大致有以下方式：

(1) 与中国汉语教材的编写者合作，以中国国内出版的汉语教材为蓝本，稍做加工，比如将原教材中的人名、地名改为本国人常见的名称，将原教材的注释由英文改成本国语。但在内容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在发音、语法方面都缺少针对本国人的特点所设计的练习。

(2) 由国外的一些出版社到中国来，寻找比较适合在本国使用的汉语教材，然后买断版权，稍做加工，在本国出版。

(3) 由外国学者或教师（多与在国外工作的中国教师合作）根据本国的情况自主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应该是最接近国别化教材的，也是在海外最被认可的。

总览几十年来海外汉语教材的概貌，无论是通用型教材在海外的使用，还是是一些国家自主编写的汉语教材，尽管它们对海外的汉语推广事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其最大缺陷就是缺少针对性，无论是在教材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上，还是在不同的思维习惯上。除此之外，语言知识上的不同也会干扰本国人正确掌握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

由此，一些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者，认为必须改变一部教材打天下的传统做法，提出要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编写出真正适合海外使用的国别化教材的设想。一些汉语教材编写者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尽管目前仍处于初期建设阶段，在理论方面还不健全，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把这一改革的步伐走下去的。

二、编写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的针对性原则

什么是国别化教材？它与过去在海外使用的汉语教材有什么区别？一些国际汉语教育方面的专家在理论上就这个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和细致的阐述。

甘瑞璵（2004）较早地将“国别化”定义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而实行不同/差别的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汲传波（2012）认为“国别化汉语教材是针对某一类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教学对象而编写的汉语教材。简言之，也可针对某一国家的教学对象而编写的教材。”他特别强调国别化汉语教材“不应是简单地对通用型教材进行外语翻译或注释”。

“国别化教材的编写跟通用教材的编写有很大的不同。汉语学习者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在学习目的、学习方式、教学时数、语言背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价值标准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各国教育传统和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为汉语国别化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于海阔、李如龙，2012）

一些语言教材编写方面的专家根据多年的教材编写经验，总结出了教材编写的几条原则：针对性、实践性、系统性、趣味性等。其中，李更新等（1983）指出针对性是教材编写的首要依据。佟秉正（1991）指出近年来讨论汉语教材的论文无不认为针对性是教材编写的首要原则。吕必松（2007：110-102）在谈到汉语教材编写原则时第一条就是“针对性”，也就是说不可

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教材。

特别是对于国别型教材的针对性，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和探讨。杨庆华（1995）认为新一代教材的基本特点应该是“突出教材的针对性”，尤其是供国外使用的教材，要考虑国别、民族、文化、环境的特点。刘乐宁（2010年）也认为，我们需要为学习环境不同、背景不同、需求不同的学习者编写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教材。因为教材的科学性首先体现于它的针对性，没有针对性的教材就谈不上科学性。

可见，编写具有针对性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以区别于国内广泛使用的通用型汉语教材，是我们搞好汉语国际教育必须迈出的一步。编写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其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考虑学习者的语言背景

要抓住学习者母语对学习汉语的影响，布置教学要点，比如发音的难度、词语的区别、语法结构的不同等，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以日本为例，日本语中没有 e 这个音，日本人在发这个音时感觉较难掌握，需要专门的讲解和练习。再比如日本是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在日语里同样存在，有些字形、意义完全一样，没有差别，这些对欧美人学起来觉得困难的词语，在日本教学时就用不着详细讲解，指出与日语相同就可以了。而有些词语虽然汉字字形相同，意义却大相径庭，就需要在教材中指出相互间的差别。如日语中的“裁判”和“审判”，和汉语中的义项是完全相反的，“手纸”在日语中指的是“信纸”等。在教材中安排这方面的比较练习，可以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可是这样的练习就不适用于对欧美学生的教学。

（二）必须考虑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习俗、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新的教材编写中，应该充分考虑以上因素，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和误会。

（三）必须考虑学习者的身份和学习需求

海外汉语学习者，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除了前面所述在年龄、学习要求、学习环境和教学环境诸方面的差别之外，还包括对中国的了解、对汉字

的认知等方面。如为同为汉字圈的日韩等国和为欧美国家编写的汉语教材就要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不同来。

正如李泉（2015）所说：“在针对性原则下，完全可以解决‘国别化’教材的各种问题，针对性就是要针对教材的使用环境、学时学制等问题，如果是给某国编写的教材，就是要适当融入和规避有关国家的文化和习俗，就是要进行语言对比等等。”

三、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的编写策略

编写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必须在一定的编写原则指导下，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编写出各具特色、适合各国汉语学习者使用的课本来，不要“以为只要把同样的几套教材用不同语言加以翻译和注解，便是‘国别化’的措施了，这显然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幼稚的想法。”（李如龙，2012）

编写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依据汉语的各类等级标准编写

近年来，国家汉语教学的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编写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语法等级大纲》等纲领性文件，为国内各级别的汉语教学大纲提供了标准。国内的汉语教材，大都是根据上述标准编写出来的。从语音、汉字、词汇到语法，比较系统地体现了汉语的基本特征。虽然有些内容还有待完善，但毕竟使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有据可依。

那么，我们在编写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时，是否也应该遵循这些标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一些专家认为，编写国别化汉语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主干教材的编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干教材，往往是这个国家汉语教材编写的样板。这种主干教材，应该是一部融听、说、读、写、译为一体的综合类教材，从某一角度来说，也可以看作某一国家或地区具有指导意义的通用型教材。这种教材与中国推向海外的通用型汉语教材不同的是，它应该在编写目标、服务对象、所选话题、文化对比等方面，都具这一国家或地区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独特之处，更能适合本国或本地区教学体制、教学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但在语音、汉字、词汇、语法等方面，还是应该遵循由易到难的语言教

材编写原则，而各类大纲就给教材的编写者提供了一定的规范。

李泉（2012，128-131）指出，编教材必须首先研究相关大纲乃至多种大纲，并从中汲取营养，选择与教材水平或等级相关的内容。否则，所编教材或者营养不足或者营养不均衡，导致其“发育不良”。当然，他也指出，教材编写也不能过于迷信大纲的理论、方法和相关原则要求、等级划分、数据规定，而应根据所编教材的实际需要合理地吸收和借鉴，不搞生搬硬套和不越雷池一步，而应有所发挥和突破。

（二）在大纲的指导下实现多元化的教材设计

随着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逐步增多，他们对汉语教材也会有不同的需求。除了大学中文专业的综合教材之外，更多的是面向社会的各类中文学校所需教材。即使是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也因为学习者的具体情况无法强求统一。李泉（2004）指出：“即使是同一国别和母语、同样的学习目的和起点、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一类学习者，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性格特征、认知风格、兴趣爱好、文化修养等，以及对目的语及其目的语国家的情感态度等，也存在差异。”因此，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也需要在大纲的指导下实现多元化的设计，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入手，满足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多元化的教材设计，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1. 了解所在国在汉语教学方面的政策和相关措施

一些国家将汉语列为主要外语课程，有的国家为促进汉语学习还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如美国规定：中学生在完成学习之后通过标准化考试，凡达到美国大学二年级（学习了250小时）中文课程标准的学生，就可以获取大学承认的学分。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因此，如果为美国中学生编写汉语教材，就必须遵循美国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以及《全美中小学中文学习目标》。2010年评优入选的《新乘风汉语》在调查目的国——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汉语教学环境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该教材认真分析了美国《全美中小学中文学习目标》，结合中国有关教学大纲，设计出专供“乘风汉语”使用的内容大纲。同期入选的《体验汉语》系列教材就是针对泰国汉语教育现状和特征，遵循本地化定制的编写原则和“体验式”教学的设计理念，为泰国基础阶段的汉语教育提供了立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于锦恩等, 2011)。

2. 了解学习者的需求

相较于来中国学习的长期留学生来讲, 海外汉语学习者, 学习动机五花八门, 有将汉语作为一门专业来学习的, 有有志于从事中外贸易事业的, 有出于来中国旅游目的的, 而更多的是把学习汉语当作一种兴趣, 由于学习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他们来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选课, 也都会关注这里是否有自己想学的课程。正如李如龙(2012)所提出的, 这些汉语教学机构, 在课程设计的制定方面, 显然不宜强调专业化、正规化, 而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针。教学组织者在开班之前务必进行深入的调查, 了解生源的特点和他们的要求, 合理地编班。既有细水长流的教学安排(如中小学的外语课), 也有集中突击的短期训练(如针对某些行业的留学人员的先修班); 有快速的口语交际培训(为满足来华旅游的需要), 也有着重于识字、书面阅读的教学(有些老年人只是为了增加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 还可以有以掌握某种文化技能为主、学习语言文字为辅的教学班(如为了学中国书画、武术或烹调的); 学前儿童有的是为了对母语和民族文化有初步了解, 则应以趣味为主, 浅尝辄止也无妨。因此, 编辑出版针对海外学习者的、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适合于个性化教学的教材, 尤其是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材、趣味性和科学性结合得好的教材会受到欢迎(崔希亮, 2010)。

3. 了解所在国的本土文化, 在教材中体现跨文化交际

中国国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 注重中国知识文化的介绍, 这类教材用于海外的汉语教学, 虽然能够引起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但往往只限于“了解”。因为对于没有来过中国的学习者来说, 他们对于课本中介绍的有关中国的知识有一种陌生感。而一旦将他们的本土文化融入汉语教材中, 体现一种跨文化交际, 则会使他们产生亲切感。所以, 我们的教材“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 适当考虑在教材中体现文化多元性, 为跨文化交际创造条件。”(王尧美, 2007)

李泉(2012: 9)指出, 在国外非目的语环境下使用的教材, 内容上要恰当地结合国别文化以及当地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生活, 进行国别化、当地化处理, 以便凸显教材内容的民族化和国别化双向取向, 更好地发挥教材的文化沟通作用, 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李泉(2015)也认为“三贴近”中的“贴近外国人的生活”对海内外的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都有一定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是编写国别型教材。当然，也指出这种贴近要适当适量，要精打细算，而不能时时处处都去贴近。

4. 要适当考虑教学的“量”

任远（1995）指出，现有“通用式”教材的弱点有三点，其中一点就是教材“量”的剪裁与当地的学制、学时不相吻合。这是由于海外学习者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学习时间分散，课时有限。因此，我们在编写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时，也应当考虑这一因素，不管是词汇量还是练习量，课文语料多少的选取，都要针对学习者的具体情况来设计，避免教材内容过多或者过少。

关于教材中的练习量，赵金铭（1997）认为，这个量如何控制，也难以量化。练习要达到教师认为“好用”，即可用它组织教学；学生上课下课“爱用”，做完教材中的练习，既巩固了课堂所学，又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这个量就是合适的。

（三）突破纸板教材的局限，创造生动的语言环境

生动的语言环境会给学习者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使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由于印象深刻而容易记住。海外的学习者在缺少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仅凭纸板教材往往使学习者感到枯燥。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必须突破纸本教材的局限，开发多媒体教材，向立体化发展。正如前面许琳（2007）所提出的，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目标的第六大转变就是“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

赵金铭（2004：184-185）在论述教材的立体化发展时指出，教材立体化的优势在于，便于教师灵活多样地组织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学习活动，更好地把课内和课外学习联系起来；便于学习者通过多种媒介和方式来学习目的语，更好地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学习者的需求。概括地说，教材立体化为教学立体化和学习立体化提供了便利，可以较好地文字材料和音像材料配合起来，把课上学习和课下学习联系起来，把视觉和听觉调动起来，把场景情景和交际功能引入进来。这样可以使教师摆脱相对单纯和枯燥的教学方式，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学习者的学习潜能，更好地发挥教师的教学潜能。因此，在教材编写设计之初就要全面规划教材的立体化问题，以使教材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可以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教学手段和技术的

不断进步，以单纯一本教科书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教材已经并将继续向着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于锦恩等（2011）指出，2010年国家汉办组织选出的20套优秀国际汉语教材中，纯纸质的有10套，占50%，数字化教材约略计算有10种，占50%，其中，纸质加CD的有6种，多媒体网络教材有4种。多媒体网络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长城汉语》和《新乘风汉语》。其中，《长城汉语》以培养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为主要目标，运用网络多媒体课件、多媒体光盘、面授、课本和练习册等多元学习方式，采用即时跟踪学习进度和测试学习效果的管理模式，依托丰富的教学资源，向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以满足海内外汉语学习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水平的学习需求。

（四）建立一个大型汉语语料库

李如龙（2012）对建立汉语语料库十分重视。他指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教材在地化问题，很有必要提倡制作一个万能的大型汉语语料库。这个语料库应该充分体现汉语的特征，齐全详尽，涵盖汉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文化各项内容；在重要性、深浅度上分层级的（常用、次常用的、初中高级的）；注译方面细分语种（英、日、法、德、西、俄、韩等）；在形式方面则应该做到立体化（字表、词表、图文、声像）和网络化（便于在网上提取）。其类别可包括字库（字形、字音、字义）、词库（按词长、词类、词义分列）、语库（口语、书面语、骈语、成语、惯用语等）、句库（句型、谚语、引用语），文库（情境会话、小故事、诗歌、散文、短论、文化常识等），题库（调值调类与变调练习、绕口令、部首偏旁练习、同义、反义词辨析、组词、析词练习、句型变换练习，汉语各种测试题）等，此外还应该还有音库、图库、像库（发音示范、音档、图片、录像）。语料库的建立，将会给编写多元化的国别化教材提供诸多方便。

受李如龙先生的启发，笔者认为也可以考虑编写一种菜单式的汉语教材。比如为儿童编写一部“韵文汉语”，可以选编十首儿歌、十首绕口令、十首谜语、十首古诗等。教材使用者可以根据学习者的爱好、语言水平和知识水平选学其中的内容。

（五）中外专家的合作是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编写的重要途径

最后，也是最需强调的一点，编写针对性强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

特别是编写主干教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仅凭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潘先军(2013)认为,要以当地教师为主导,通过多种渠道与中方教师合作编写国别性教材,双方取长补短,国家汉语推广部门和机构给予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

2010年国家汉办组织选出的20种国际汉语教材当中至少有8种是中外合作的成果。有中国和外国教育部之间的合作,如迄今为止中美两国教育部之间最大的教育合作项目——中美网络语言教学项目开发出的《乘风汉语》,就是中美双方教学和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结晶。也有的是中国孔子学院的教师编写的教材在相应国家的出版社出版,如哥伦比亚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慧晶编写的《循序渐进汉语》就是由安第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些教材的出版大大加快了汉语教材、汉语教学本土化步伐,提高了国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的针对性(于锦恩等,2011)。

当然,合作编写国别教材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需要主管部门在人力、财力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双方都要选派专业人士花大气力编写,发挥双方的特长,共同努力。此外,合作编写国别教材同样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研究和精准的实施(丁安琪,2011)。

参考文献

- [1] 崔建新. 从加拿大汉语教学现状看海外汉语教学. 汉语学习, 2005 (6).
- [2] 崔希亮. 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语言文字应用, 2010 (2).
- [3] 丁安琪. 国别汉语教材编写的思考与探索.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 2011 (1).
- [4] 甘瑞瑗.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5] 国别化汉语教材与跨文化交际//《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 2012.
- [6] 李更新, 程相文, 谭敬训, 刘希明, 王碧霞. 编写《高级汉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3 (4).
- [7] 李明. 海外教学环境下汉语教材的取舍调整.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
- [8] 李 泉. 论对外汉语教材的针对性.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2).
- [9] 李 泉. 对外汉语教材通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0] 李 泉. 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世界汉语教学》，2015 (4).
- [11] 李如龙. 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 (5).
- [12] 刘乐宁. 论汉语国别教材的适用性. 海外华文教育, 2010 (2).
- [13] 陆俭明. 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几个问题.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3 (3).
- [14] 吕必松. 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5] 潘先军. 国际汉语教材的通用性与国别化.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2013 (2).
- [16] 任 远. 新一代基础汉语教材编写理论与编写实践.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 (2).
- [17] 佟秉正. 初级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 1991 (1).
- [18] 王尧美. 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 (4).
- [19] 许 琳. 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 世界汉语教学, 2007 (2).
- [20] 杨庆华.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设想——在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推荐教材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 (4).
- [21] 于海阔, 李如龙.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教材几个问题的探析. 民族教育研究, 2012 (6).
- [22] 于锦恩, 蒋海宁, 程倩倩. 当前国际汉语教材国别化的走势简析——以2010年20种优秀国际汉语教材为例. 国际汉语教育, 2011 (2).
- [23]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2).
- [24]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简介：

董琳莉，女，北京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教材编写与研究。